

## 蜀刻唐人集之《孙可之文集》

《孙可之文集》，一名《经纬集》，又名《孙职方集》，唐孙樵撰。樵字可之（见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注），一说字隐之（见《文献通考》）。关于他的生平，见诸文字记载的很少。他在文集自序中说“家本关东”，但究属何郡何县，无从考证。又据集内《梓潼移江记》篇末题“是岁开成五年也”，说明他在唐文宗时已从事著述；自序又言登大中九年进士第，广明元年诏赴唐僖宗岐陇行在，授职方郎中。据此推断，孙樵大约活动在晚唐时期，历经文、武、宣、懿、僖几朝，以文学见称。（《自序》）《与友人论文书》中说：“顾顽朴无所知晓，然尝得为文之道于来公无择，来公无择得之皇甫公持正，皇甫持正得之韩先生退之。”可见，他以韩愈的再传弟子自居，是唐朝古文运动的拥护者和参与者。后世一些人很重视并推许他在散文方面的成就和影响。

本集十卷，辑文三十五篇。自序说是作者自己从平生“所著文及碑碣书檄传记铭志”两百余篇中删择出来的。曾有人怀疑其中大部分系伪撰，但无显证。孙樵著作，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未载，自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记载孙樵《经纬集》三卷，《通志》、《文献通考》因之，《郡斋读书志》著录同。《宋史·艺文志》则去“经纬”之名，直称《孙樵集》三卷。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记载孙樵集十卷，且言“自为序，凡三十五篇，盖其删择之余也”。近代一些书目，也著录为十卷。留传至今的孙樵文集，仅见十卷本，卷帙适符陈氏书目和孙樵自序。如果不是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等书籍记载有误，那么很可能当初孙樵文集是有三卷、十卷两种本子并存于世的。

至于传世的诸种版刻，明代正德十二年王鏊、王谔刻本是较早而又难得的本子。王鏊认为：“昌黎海也，不可以徒涉；涉必用巨筏焉，则可之是也。”表明了他刻孙可之文集，是为了传播韩愈的为文之道。正德以后较有影响的有明末毛晋汲古阁刻《三唐人集》本。清邵渊耀为汲古阁刻该书的递修本作跋，也把孙樵的文章视作学韩愈的门径，“俾学韩者得所津逮”。此外还有明天启五年吴讪石香馆刻本、明崇祯乌程闵齐伋刻本、清嘉庆孙冯翼问经草堂刻本、清光绪二年冯焌光读有用书斋刻本等。但各本所据，大率源于正德本。其中较通行的毛晋汲古阁本亦“乃震泽王守溪先生从内阁录出者”。守溪即王鏊，可见也是源于王鏊刻本的。

南宋以后几百年间，孙集宋刻本一直罕见。难怪清代何焯因传世本“讹脱尚多”，有“恨无从觅宋本”之叹。黄丕烈是广见博识的藏书家，曾断言“《孙可之文集》，毛刻《三唐人集》而外，世无刊本”。当他见到宋蜀刻本时，遂认为“所见有胜于前人”。从北京图书馆藏两部宋蜀刻本中藏印极少、历来各家书录又很少有关这一宋刻的记载来看，说明近代一些著名的藏书家确实未曾见到过该书。

现在经过对勘，可知宋刻本《孙可之文集》和正德本及以后诸刻的渊源关系，以及存在的明显歧异。

首先是卷次内容互倒。汲古阁《三唐人集》是据“震泽王守溪先生从内阁录出者”。黄丕烈以宋本对勘，发现卷二、卷三互倒。“知内阁本非宋刻”，“当以宋刻为是”。

其次是文字有异。文三十五篇，而异处不胜枚举。宋本虽亦有讹脱处，但明显地优于正德本。例如卷五《龙多山录》，宋本为“樵起辛而游泊申（当为甲）而休登降信宿闻见习孰姑曰山乎曾未始有传乎”。辛，正德本作“耒”；泊甲，正德本作“泊车”；姑，正德本作“始”；传，正德本作“得”。

卷八《刻武侯碑阴》，宋本为“独谓武侯治于燕爽”，正德本则为“独谓武侯之治比于燕爽”。

无怪清代顾广圻在校出上述问题后，认为“传之多失”，“见宋刻而后知正德本之谬，校定书籍可不慎哉”！

毛刻本与宋本校，毛刻本除沿袭正德本的舛误外。又增加了新的舛误。卷八《唐故仓部郎中康公墓志铭》“尚书仓部郎中”以下“杨崑……屯田郎中”二十四字，毛刻本竟脱漏。

至于吴郡刻本，由于出之传抄本之故，错误更不为怪。傅增湘曾用影印宋刻本校订，“文字讹舛改正殆逾百许”。

由此可见宋蜀刻《孙可之文集》在文字内容上的重要价值。此外，在版刻艺术上，《孙可之文集》也是不可多得的珍品。宋时成都、眉山地区刻印了大量书籍，“蜀本”与杭州“浙本”、建阳“建本”并列，享有盛名。《孙可之文集》为现存蜀刻十二行本唐人文集之一，与上海古籍出版社已影印出版的《张承吉文集》为同一时期的刻本，镌刻隽美，楮墨精良，既是珍贵的文物，又是优美的艺术品。

近代一些学者，早就希望能有《孙可之文集》行世。涵芬楼曾影印过此一宋本，收入“续古逸丛书”中，但印数极少。这次上海古籍出版社重新影印此一宋刻，使千百年前我国劳动人民的艺术杰作得以再现，为国内外广大读者所鉴赏，同时也为专家学者开展学术研究提供便利条件，因而是一件值得欢迎的事情。

（陈杏珍《蜀刻唐人集》出版前言）

**孙可之文集十卷**（唐）孙樵撰 宋刻本。框高20.2厘米，宽14.5厘米。每半叶十二行，行二十一字，白口，左右双边。

孙樵字可之，一作隐之。《孙可之文集自序》称“樵家本关东，代袭簪缨，藏书五千卷，常自采讨。”然正如《四库全书总目·孙可之文集》提要所说“函谷以外，幅员辽阔，不知其籍何郡何县也。”其自序又称“大中九年（855）明登上第”，就是说他于大中九年（855）擢进士第，授中书舍人。故其自序称“从军邠国，忝历华资，久居兰省。”至僖宗广明元年（880），黄巢兵犯长安，僖宗驾避岐陇，又将其召赴行在，迁职方郎中。据此，我们大体可知孙氏大约活动在晚唐时期，历经文、武、宣、懿、僖几朝。

《孙可之文集自序》称自己“幼而工文，得之真诀，提笔入贡士列，于时以文学见称”。第三卷《与友人论文书》又说：“顾顽朴无所知晓，然尝得为文之道于来公无择，来公无择得之皇甫公持正，皇甫持正得之韩先生退之。”可见他以韩愈的三传弟子自居，显然是唐朝古文运动的拥护者和继承人，故后世很推许他在散文方面的成就。明正德十二年（1517）王鏊、王谔刻孙氏文集时，也说“昌黎海也，不可以徒涉，涉必用巨筏焉，则可之是也”。亦足见孙樵之文是承载着韩愈的为文之道的。当然，苏轼亦曾批评说“学韩愈而不至者为皇甫湜，学湜而不至者为孙樵”。

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著录孙樵《经纬集》三卷，《郡斋读书志》、《通志》和《文献通考》因之。《宋史·艺文志》则去“经纬”之名，直载《孙樵集》三卷。《直斋书录解题》卷十六著录《孙樵集》十卷，并谓“自为序，凡三十五篇，盖其删择之余也”。陈氏之说，与现存宋蜀刻此本正相吻合。此集中和四年（884）孙可之自序称“樵遂阅所着文及碑、碣、书、檄、传、记、铭、志，得二百余篇，藁其可观者三十五篇，编成十卷，藏诸篋笥，以贻子孙”。可见陈振孙当年所著录的本子，仍保留着唐时孙氏自编时的规制。而陈氏所著录的这个本子，就是我们今天所要据以影印的宋蜀刻唐人文集本的《孙可之文集》。

传世宋蜀刻唐人文集有两个系统：一为十一行本，约刻于南北宋之际，今存骆宾王、李太白、王摩诘，日本还藏一种，凡四集；一为十二行本，约刻于南宋中叶，今存世者尚有十九种，其中就包括十卷本的《孙可之文集》。十二行本蜀刻唐人文集，书中光宗赵惇御名“惇”字及嫌名“敦”字皆缺笔避讳，表明其刻已届南宋中叶。勘核现存这个系统的蜀刻唐人文集，其版式行款、字体风格、印纸墨色如出一辙，因疑其为断代总集丛刻之散出者。据程有庆考证，宋王楙《野客丛书》卷五，出现了《唐六十家诗集》一名，但未说明由谁在什么地方出版。宋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·王右丞集》提要亦称：“建昌本与蜀本次序皆不同，大抵蜀刻《唐六十家集》多异于他处本。”王楙生于南宋绍兴二十一年（1151），卒于南宋宁宗嘉定六年（1213），福州福清人，所著《野客丛书》分门类聚，钩隐抉微，考证经史百家，下至骚人墨客，佚草佚事，细大不捐。所记《唐六十家诗集》，在他下世前十七、八年已经行世，当为亲眼所见。陈振孙晚他三四十年，但是著名的目录学家，其所谓“蜀刻《唐六十家集》多异于他处本”之说，绝非无稽之谈。这就证明南宋中叶四川眉山地区的确刻过一部《唐六十家集》。直到明代杨士奇等核编的《文渊阁书目》，其卷十仍著录两部残宋本《唐六十家诗》，说明历史上确曾有过《唐六十家集》丛刻行世。这个问题一解决，现存宋蜀刻十二行系统本唐人文集的版本问题便迎刃而解了。此本《孙可之文集》便是其中的一种。因此，此本亦可定为“南宋中叶四川眉山地区刻唐六十家集本”。孙氏文集的宋刻本一直罕传，明清两代传本却不少，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传本是明正德十二年王鏊、王谔刻本。然顾广圻以王本与此宋蜀刻本对勘后，认为正德本“传之多失”，“见宋刻后知正德本之谬，校定

书籍可不慎哉！”由此可知宋蜀刻本之珍贵。

此本钤有“翰林国史院官书”、“刘体仁”、“颍川留考功藏书印”、“郇斋”、“祁阳陈澄中藏书记”等印记。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。

（李致忠《中华再造善本提要》）

